



张爱玲 沈从文 贾平凹文化心理研究
ZHANGAILING SHENCONGWEN
JIAPINGWA WENHUA
XINLI YANJ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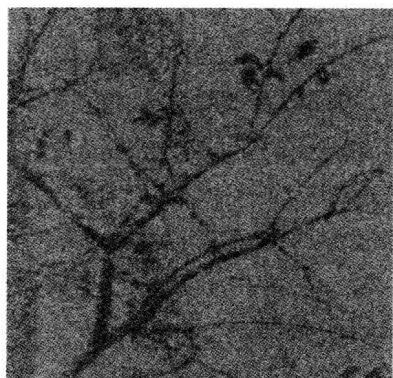
张爱玲 沈从文 贾平凹

文化心理研究

布小继 李直飞 苏宏 /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文化心理研究

张爱玲 沈从文 贾平凹

布小继 李直飞 苏宏 / 著

ZHANGAILING SHE
JIAPINGWA WENHUA
XINLI YANJIU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徐 凯
责任校对:王 冰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沈从文、贾平凹文化心理研究 / 布小继,
李直飞, 苏宏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5614-5265-3

I. ①张… II. ①布…②李…③苏… III. ①张爱玲
(1920~1995) —文学研究②沈从文(1902~1988) —文
学研究③贾平凹—文学研究 IV. ①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73698 号

书名 张爱玲 沈从文 贾平凹文化心理研究

著 者	布小继 李直飞 苏 宏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5265-3
印 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6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目 录

第一编 张爱玲文化心理研究	(1)
第一章 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原罪意识	(3)
第二章 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13)
第三章 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贵族意识	(23)
第四章 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现代意识	(33)
第五章 张爱玲悲剧意识探源	(44)
第六章 张爱玲后期悲剧意识分析	(57)
第七章 《色 戒》的创作文化心理	(65)
附录一 还原历史还是遮蔽真相 ——几部土改题材小说的意识形态考辨	(75)
附录二 香港传奇与日常叙事 ——施叔青小说简论	(83)
第二编 沈从文文化心理研究	(89)
第八章 沈从文自由意识的生成及其特征	(91)
第九章 沈从文自由意识与存在主义的契合	(104)
第十章 沈从文自由意识对其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	(125)
第十一章 沈从文自由意识对其创作题材选择的影响	(139)
第十二章 沈从文自由意识对其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	(147)



第三编 贾平凹文化心理研究

——以长篇小说《秦腔》为中心…………… (153)

第十三章 从叙述视角到视角叙述

——叙事技巧的文化心理分析…………… (155)

第十四章 从思考深度到深度思考

——思想内蕴的文化心理分析之一…………… (163)

第十五章 从家族文化心理到民族文化心理

——思想内蕴的文化心理分析之二…………… (170)

第十六章 从洞见的历史到历史的洞见

——思想内蕴的文化心理分析之三…………… (176)

参考文献…………… (181)

后 记…………… (187)

第一编 张爱玲文化心理研究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很大影响力的天才作家。十几年来，“张爱玲热”高潮迭起，研究者众多。“张学”已经像“鲁迅学”、“金学”那样，逐渐成为一门“显学”。但从文化心理角度对张爱玲的创作进行较为完整分析的眼下并不多见。本编由此切入，希图将张爱玲创作的研究开掘到一个较深的层面。

本编有七章，并加了两篇附录。主要内容如下：前四章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入手，分析论述了原罪意识、女性意识、贵族意识和现代意识在其中的表现；第五章和第六章专门探讨张爱玲的悲剧意识，由于其创作前后期差别较大，所以分开阐述。第七章以《色戒》为个案，研究其中的创作心理。附录一以张爱玲为中心，探讨“土改小说”的书写方式和目的。附录二探讨受张爱玲影响较大的作家之一——施叔青的香港题材小说的叙事特征。

第一章 张爱玲小说创作中的原罪意识^①

原罪源于《圣经》创世纪中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经不住蛇的引诱偷吃了上帝告诫不能吃的禁果——能够分辨善恶的“智慧果”。“智慧果”虽然好吃，但代价却是巨大的：亚当和夏娃在“吃的日子”虽然没有（肉身上）死去，但却失却了乐园（实乃精神上死去）。不仅如此，他们的后人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不得不为他们承担后果。故而原罪有三层含义：（1）我们都是罪人。始祖亚当犯罪，不顺服神，结果罪就从一个人入了世界……因而我们都处在罪人的地位上。（2）我们都有罪性。（3）罪咎，即我们都要承担犯罪的后果。亚当犯罪后看到自己赤身露体，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遮盖，躲避耶和华神，推卸责任。^②

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和中国传统文化浸濡的张爱玲，长期以来就因其作品的丰富性和多义性而成为一个谜。其作品难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表现了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的原罪意识。各色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根深蒂固的原罪意识，导致了人物产生了诸多难以理喻的心理和行为，也使小说主题具有多义性、复杂性和难解性。

一、人物塑造中的原罪意识

如果把张爱玲的小说比作一座巍峨挺拔的宫殿，那么她笔下的一个个人物形象就是这宫殿中的一柱一梁、一砖一瓦。揭示张爱玲

^① 本章曾以《原罪意识与张爱玲的小说创作》为题发表于《云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收入本书后有改动。

^② [英] 汤姆·华森：《系统神学》，罗伟伦、钱曜诚译，台北加尔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166页。



小说的奥秘，不妨从该角度切入，定会有所斩获。

英国当代著名戏剧理论家阿·尼柯尔说过：“所有伟大的悲剧都是提出问题，而不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① 对于张爱玲来说，认识人生就是认识人生的悲剧性，她将人放置于空虚、幻灭的重压之下；认识人生就是充分揭示人物身上的罪孽，由于特定的生存环境——殖民地的香港及半殖民地的上海和身世背景——封建大家庭的制约，人物身上的罪孽总是如影随形，不即不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主要有三类人物形象：疯狂的妇人、自私的罪人和无助的时代弃儿。这些人物所具有的悲剧意味是不言而喻的。作者经常把他们放在罪人的位置上加以刻画。这些人物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罪过，因而，虽然小说中他们的表现不尽相同，但其结局却是惊人的一致：他们无力逃脱“心狱”的无形牢笼，成了名副其实的罪人。

疯狂的妇人的心路历程都带有强烈的罪性，她们无法不犯“罪”。罪性融入血液，见诸言行，浑身上下都弥漫着罪过呛人的味道。情节模式是：欲望得不到满足—追求金钱、追逐爱情以满足欲望—欲望的无限膨胀—异化而致疯狂。她们以欲望始，以欲望终。这类人物的心路历程是清晰可辨的，追求物质化，人格低俗化，形象妖魔化，在罪恶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对《金锁记》中的曹七巧而言，为追求金钱而以幸福做赌注嫁给姜家的残废二爷是疯狂，为满足情欲勾引小叔子季泽是疯狂，为打发空虚要求新婚儿子整夜陪自己抽大烟是疯狂，为控制女儿而不许她继续念书甚至嫁人亦是疯狂，当然疯狂的极致就是守住了黄金却被黄金锁住，世间的一切统统归于幻灭。疯狂背后是罪性，这只无形的手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她的所作所为。葛薇龙的姑妈梁太太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欲，“嫁

① [英] 阿·尼柯尔：《西欧戏剧理论》，徐士瑚译，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页。

了粤东富商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①。为了打发老公死后的空虚并拴住乔琪乔等人，被其作为棋子的葛薇龙，也一步一步地堕入了社会交际圈的染缸。计划失败后，梁太太陷入了更加无边的空虚（《沉香屑 第一炉香》）。自己是罪人还要拉别人一同成为罪人，沉湎于罪中依然醉生梦死，可见其罪性是何等深重。而更加不可理喻的是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对尚可救赎的年轻人施以诱惑使之下水。疯狂来自欲望，欲望来自原罪。

自私的罪人泯灭了神性，缺少觉悟，不敬神。他们推卸职责，遗毒后世。贪财、刚硬、悖逆均由他们身上的原罪派生。这类人物的人生信条是自己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并教他人苟且偷生得过且过。原罪导致自私，自私导致更大的罪、更大的恶。《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留过洋的公司职员佟振保处于一种为摆脱空虚而不断寻找目的物的状态中。为了摆脱空虚，他勾搭上了王娇蕊；为了满足空虚，他召妓宿娼，不惜让妻子孟烟鹂成年累月地独守空房。尽管头天晚上，“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觉得他旧日的善良的空气一点一点偷着走近，包围了他。无数的烦忧与责任与蚊子一同嗡嗡飞绕，叮他，吮吸他”。可是，“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可见他毫无忏悔之心。《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兄嫂在耗尽了她的钱财后，就将其视为“天生的扫帚星”，认为“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就连她的母亲，在女儿孤苦无助寻求最后的庇护时，竟然也说：“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浪荡公子范柳原，四海漂泊，“被女人捧坏，从此把女人看成他脚下的泥”。《半生缘》中顾曼璐的母亲，为了自保，不仅为虎作伥地帮着曼璐残害曼桢，而且又因为收到曼璐的钱而昧着良心将曼桢男友的信件拱手交出，贻误了救助曼桢的良机，自私到了极点。《心经》中的许小寒，由于恋父而不惜毁掉母亲一生的幸福，

^① 张爱玲：《倾城之恋》，见《张爱玲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49页。本书对于张爱玲作品的引用，除特别注明出处外，均出自《张爱玲集》。



虽然母亲最终原谅了她，可她还是“哭了起来。她犯了罪。她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一块割碎了——爱的凌迟！”自私浸透骨髓，罪咎遮蔽心灵，纯洁的本性被玷污，人物在一次次自私的行动中消解善举而加重恶行。

无助的时代弃儿身上也体现了深深的原罪。人物的原始心态受原罪意识支配且决定了人物的行为，使他们不能够见容于时代，注定是时代的局外人和漂泊者。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需要决定动机，动机决定行为。趋利避害、好逸恶劳都是人的本性。急剧变动的大时代，需要的是热血青年的为国为民、忠勇志士的奋不顾身。小家的安危必然系于大家的安危，个人命运的把握单靠自身是无力完成的。封建旧家庭出身的人物身上有着太多的苟且和麻木，又深受殖民思想之荼毒，卑琐的心灵难以有惊人之举，而遵循既定的轨迹只能放流自身于时代之外。正如《倾城之恋》开头意味深长的描写：“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倾城之恋》中的男女主角，各自被自己的家庭遗弃，相遇后，“又为对方那熟悉而又相违的古老血缘所吸引，又相互被早已穿透的功利心计与争斗相排斥”^①。如果说主人公在形（肉体）的方面勉强可以互为依靠的话，在灵（精神）的方面则早已千疮百孔，不堪修补，绝望深植于人的内心。基于对自身罪孽的低层次省察和对周围世界判断的极不确定性，范柳原曾如是言：“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堵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短短一句话中的几个“也许”，实际上已为无助无奈的人生命运作了注脚。

原罪意识之投射和映照，极大地丰富了张爱玲笔下人物形象的内涵，作家也完成了对世界的某个层面所作的系统观照和体察。读者在精神和情感上一次次历险后，在震撼的同时必然要追问同一个

^① 于青：《张爱玲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问题：罪如何才能为善所取代？

二、主题建构中的原罪意识

张爱玲小说主题建构中的原罪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主人公命运的设计、对人的生存状态的理解和对人的心灵秘密的探求。与之对应的有三大主题：压抑主题、复仇主题和苍凉主题。

相对于男性，女子在封建宗法社会中更多地处于受压制、被奴役的常态地位。心理失衡、对压制者（男性）的敌意、对自我的摧残，都是受虐者的共性之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的本能欲望长期受到压抑，如不能得到恰当的宣泄，便会引起心理疾病，导致性变态或其他心理障碍。女性变成女奴，恶暂时沉隐，罪性却被强化，埋下了祸患的种子。有着极强的情欲、金钱欲的非理性的梁太太的多年隐忍，葛薇龙从对现实的软弱无力的反抗到对姑妈所作所为的积极配合（《沉香屑 第一炉香》），曹七巧初入姜家时的忍气吞声（“进得全身的筋骨和牙根都酸楚了”，《金锁记》），白流苏之母规劝女儿的言辞（《倾城之恋》），这些女性所受的压抑所导致的心理变态都是不言自明的。这既可看做是作家对于人性的客观表达，又可见出女性根深蒂固的作为男性附庸的意识。“一方面，女性的社会身体是体现父系文化想象的集体产物，即视女性为一种符号，如欲望的符号或压抑的符号，把女性贬为物体、商品，使其具有交换利益的功能。另一方面，女性的社会身体又是父权社会建构主体的参照对象，在二元对立思维体系中，以女性的附属性去凸显男性的主体性。”^① 在只有身体作为可供开发的资源时，女性的罪孽就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悲剧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暴力是张爱玲精心营造的意象，也是人物命运发展的必然。罪行罪孽积郁太久而没有宣泄消弭之途，又不行善举甚至视善如恶，疯狂自私者越走越远终入万劫不复之境后，复仇式的反抗就成了不

^① 林幸谦：《荒野中的女体——张爱玲女性主义批评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8页。



二之选，尽管这与托尔斯泰所说的“勿以暴力抗恶”相去甚远，但复仇主题表现各异，或哀婉，或淡然，或倔强的反抗虽然不都是彻底的，其美学意义却已凸现。曹七巧用情欲压抑缝隙中生发的暴力，对姜家、也对自己进行了歇斯底里式的复仇，毁掉了别人的幸福，也被自己的暴力之火烧为灰烬。与之类似的是《半生缘》中的曼璐，她囚禁妹妹，迫使其与祝鸿才发生性关系，以此满足私利，达到自己的复仇目的。白流苏对“小我”被侵犯了尊严，被众人忽视、冷淡、践踏后的耻辱的复仇则是另一种方式，那就是与众人仰视中的范柳原成婚，重新在众人心目中树立了“太太”的地位。《封锁》中的吴翠远则通过与电车里邂逅的吕宗桢恋爱，完成了对于家人的复仇。人的心灵如此卑琐，人的行为必然呈现为着魔似的、不可理喻的罪。实际上，“原罪使我们的思想不断地在图谋行恶，并使我们的双手将之实践出来。在它里面没有安定的（quietist）原则，而是一个不安定的原则（principium motus），就好像一直不断地跳动的脉搏一样。”^①

苍凉主题来自于现实人生的不可抗拒性和阶级、家庭及社会的原罪。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于是，“作为现象展现在张爱玲眼前的，则是与整个时代、社会、人生脱节的腐败。”^②《倾城之恋》中，范柳原本要只身一人到英国去，如果不是战争，他的行程是不会改变的，那么也就很难预料他和白流苏的恋爱如何收局了。可竟然是战争，毁灭万物的战争成全了他们并非出于真心的爱情。《创世纪》中，年老的戚紫薇靠典当当年的陪嫁物来维持全家的生计，

① [古罗马]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47页。

② 于青：《张爱玲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161页。

面对贫困、孤独、子孙的不肖，她只能发出无奈的幽忧的叹息：“也真是个寂寞的世界呀。”残酷的现实，使浮萍似的人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归属感，尤其是封建遗老遗少和上海租界的贵族男女们，尽管意识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将要毫无疑问地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内心深处却无一例外地加以抗拒。在时代洪流面前，任何抗拒都是徒劳的、悖逆的，但又是最能见出人心世道的。他们的生存之道在于明哲保身，为苟且存活而无所不用其极，缺少同情怜悯和起码的人间友爱，表现出了“本质的朽坏”和“善的缺乏”。^①人生的色彩自然是无尽的苍凉和难以言说的辛酸。存在主义哲学关于人的“被抛入性”命题，揭示了人的生存“焦虑”（包括可能性、事实性、堕落性和死亡性），都会使人体验到“虚无”。“虚无”作为一种神秘的力量，是人无法回避的。^②这也是封建没落家庭出身者必然会有余绪。

正如罗马帝国后期的著名基督宗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所说的：“既然我们是亚当的一部分，因此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犯了罪（Omens onus illi Adam forerun）。”^③但原罪又绝非具体的罪恶，犯罪的念头可以长期潜伏而不爆发，也可以以咄咄逼人的态势表现出来。前者或是得到某种善行的救赎，或是为客观条件所约束；后者则是恶的部分或全部的释放。张爱玲小说中以上几个主题的表达，无不和原罪意识紧密联系。

三、人性恶展示中的原罪意识

就张爱玲小说中人性恶的展现而言，有邪恶、奸恶和恶浊三种。

邪恶无疑是恶性、恶行中最为深重、最为昭彰和最为彻底的。

① 卓新平：《宗教理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94页。

② 参见刘宗坤：《等待上帝还是等待戈多？——后现代主义与当代宗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25页。

③ [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1页。



不仅破坏力大，杀伤力强，而且对于人性中善的毁灭也最持久。本质（精神）彻底朽坏，任由恶行恣肆，以恶报善，心灵的空虚幻灭也达到了顶点。人性让位于兽性，人心便成为兽心。在无法遏止的邪念冲动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不仅追问长白夫妻的私事，还大肆渲染，致使儿媳芝寿不堪其辱而亡；又耗费心机阻止了女儿长安与童世舫的恋爱，毁掉儿女应该拥有的幸福，她的母性彻底泯灭了。《半生缘》中的曼璐，曾因养家糊口、培育弟妹而出卖青春，堕落为娼，却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男人祝鸿才一起诈骗妹妹曼桢使其落入陷阱，还要冷笑着说：“我那时候要是个烈女，我们一家子全饿死了！我做舞女做妓女，不也受人家欺负，我上哪儿去撒娇去，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就这样，手足之情荡然无存。《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是一个“精神上的残废”，在缺少爱的环境中长大，将自身的不幸归结为母亲当初婚嫁的错误选择，对真心关心自己的无辜女孩言丹朱施以近乎致命的暴力，友情完全丧失了。“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聂母这只美丽的与真爱擦边而过的鸟，生前就自己承受着苦楚，死后还要受到邪恶儿子的诟病。邪意味着无法走正，恶是邪念肆意泛滥所致的灾难性后果。

奸恶绝非大奸大恶，不过是小人物为满足私欲所致的罪过而已。《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一再地被情欲拖着往下沉，“他的抵挡不住异性的诱惑实质上是抵挡不住自己情欲的诱惑”，玫瑰、王娇蕊和孟烟鹂等几个女人的出现只是充当了他的“情欲的测度计”。正是情欲的无限扩张使佟振保无法成为他的“对”的世界中的“主人”。《色戒》中的王佳芝，为勾引汉奸易先生，宁愿牺牲自己的贞操，但在执行刺杀易先生任务的紧要关头，却把他对自己的玩弄当成了真爱。这一发现令她“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放走了易先生。佳芝他们一伙人当天下午就被逃脱了的易先生一网打尽了。《花凋》中的郑先生，一副“标准上海青年绅士”模样，

他“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女儿川嫦生病，他不愿“把钱扔到水里”，任其“一寸寸死去”。女儿死后，却花钱在其坟头添了个大理石的天使，碑上撰制了新式的行述：“川嫦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爱音乐，爱静，爱父母……无限的爱，无限的依依，无限的惋惜……回忆上的一朵花，永生的玫瑰……安息罢，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他既不想承担起作为父亲的责任，又不想被别人视为不负责任的人。他们心中未藏善念，有着明显的害人之心，也不惜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但严重性明显弱于前者。小说集《传奇》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有这样一个指向：主人公的结局从某种程度而言，是一开始就注定了的——一步行恶就不可收拾，回不了头。

恶浊也是欲念使然，虽然没有造成特别不堪的后果，甚至人也意识不到自己在行恶，但与生而来的欲念必然在某个时段某种情景中得到触发和强化，害人害己还是免不了的。《心经》中的许小寒由于恋父，成了父母亲之间的第三者，致使许太太和许小寒以及许小寒和她的友人段绫卿，为男人、丈夫与父亲各自不可避免地伤了彼此。“篱上的藤努力往上爬，满心只想越过篱笆去，那边还有一个新的宽敞的世界。谁想到这不是寻常的院落，这是八层楼上的阳台。过了篱笆，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空得令人眩晕。”被父亲摔倒在地后，许小寒的腮被自己的指甲划破，淌血。最终，父亲还是走了，她独自面对着一个空荡荡的世界。《封锁》中的吕宗桢和吴翠远，前者是为了气气自己家的太太：“气气他太太也好！谁叫她给他弄上这么一个表侄！气，活该气！”后者则是因为恨家里的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于是，电车里一对陌生的男女就恋爱上了。他们以对家里人的怨恨为出发点，寻求到的是瞬间报复后精神上的愉悦，而尚不知情的被报复者无疑成了受害者。《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懋细，把正常的夫妻生活视为禽兽行为，在新婚之夜离家而去，结果闹得满城风雨。致使开着汽



车，春风得意，“深信他绝对不会出乱子，他有一种安全的感觉”的丈夫罗杰·安白登，在恐怖感中了结了自己的一生。

人是可怕的，人心是冷酷的，若干小人物对文明的践踏、对人类道德律令的公然反叛，本身就是罪恶。他们在满足和放纵欲望的同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忽视了自身之罪，才会在罪恶中难以自拔，这正是人性中存在的最为根本的问题。张爱玲揭示的人的罪恶欲望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对于情欲、金钱和物质的无休无止的贪婪。

“原罪导致一切的本罪。原罪是点燃罪恶的火引（fumes peccaries），它是所有实际罪愆怀胎的地方。它是一切谋杀、奸淫、掠夺的来源。虽然实际的罪愆（本罪）与原罪比起来，较为声名狼藉，但原罪更是可憎的；肇始的起因是更甚于其结果的。”^① 米兰·昆德拉也曾说，小说如果放弃了对人的探索，那就是小说的死亡。张爱玲作为一位品位纯正的作家，“探索人性，拷问灵魂，揭示文明与人性的冲突是她在小说中孜孜以求的目标”^②。

“原罪决不等于具体的罪恶。‘原罪’产生于人的自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命运。在现代社会中，‘原罪’象征着人与自己本质存在的悲剧性分裂。”^③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处于西洋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对峙中，畸形的现代化进程伴随了人性的堕落，那些找不到自己心灵栖身处所的现代中国人，因为不能反省自我之罪性，致使罪恶四处丛生。

张爱玲从心理层面的刻画描摹入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原罪意识对人生世态加以观照，进而打通了原罪与人性二者间存在的联系，使之贯串于其小说的人物塑造、主题建构和人性恶的描述之中。这些充溢着深刻批判色彩的小说，也就因展示了永恒的人性而散发出永久的魅力；张爱玲的小说创作又因为这种展示而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① [古罗马] 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 81 页。

② 转引自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第 73 页。

③ 参见宋剑华：《基督精神与曹禺戏剧的原罪意识》，载《文学评论》2000 年第 3 期。